

翻译研究的新描写主义途径:问题与方法

桑仲刚

(西安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自 20 世纪末以来,旨在重构翻译规范的描写翻译研究成了翻译学研究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翻译规范”与翻译操作行动之间的距离太大,研究中需诉诸主观解释和经验判断,从而使得这种自然实证主义研究走向了折衷主义困境。同时,描写翻译研究本应是一个“从不知到知”的探究性过程,但基于已有理论框架解释所收集的实证数据,又使其陷入了“不需要又离不开理论”的困境。新描写主义主张诉诸科学性、学理性观察工具的“精致描写”,倡导摒弃质性描写和为迁就理论而证明其正确的“循环性”描写。据此,可构建以探究翻译问题和以证伪、修订现有理论为目的的描写翻译研究新途径。

关键词:描写翻译研究;困境;新描写主义

A Neo-descriptivist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 Problems and Methods

SANG Zhongg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Ever since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norm-base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been one of the mainstream paradigms. However,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s and experience-based judgments are inevitable since there is a 'gross' exaggeration between translation norm and operational translation act. This brings the naturalistic positivist research into eclecticism.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s it is, are exploratory inquiries starting from 'not knowing' and ending up with 'knowing'. When using the existing 'norm theory' to account for the observable data, one will bring the research into another predicament, that is, it needs to go without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which is impossible. Neo-descriptivism highlights 'rigidified descriptions' by using scientific or theoretically-evolved instruments and excludes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and 'circular description' which only targets at justifying the correctness of existing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In light of this methodology, a neo-descriptivist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been framed, highlighting the aim of investigating authentic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that of falsifying and modifying the exist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Key words: descriptivist translation studies; predicaments; neo-descriptivism

1. 导言

人文、社会科学有两个传统:解释主义和实证主义。前者基于唯名论或主观主义本体论,主张理解就是根据已有经验就对象进行解释;后者基于实在论或客观主义本体论,认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规则性和规律性,对此需采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方法实现客观知识的构建(Burrell & Morgan 1979:37)。实证主义研究可分为自然性和控制性两类。控制性研究是以假设为出发点,通过操控

条件和干预事物的状态或进程,实现对该假设进行证实或证伪的演绎性过程。自然性研究亦称为描写研究,是对自然情景中的对象所实施的归纳、探究性研究,主体价值、立场无涉的客观性观察是其获取研究数据的主要途径,具体包含事先不确定目的和范围的广泛观察,以及聚焦于研究对象某个或某些方面的针对性观察(Williams & Chesterman 2002:60;Bouma 1993:18)。

描写研究也是语言学和翻译研究的重要方法。如 Bloomfield(2002:1-19)所言,语言的描写是通过比较和观察日常情景中的真实语言材料,对其形式特点和结构规律进行“归纳性概括”(inductive generalization)的过程。Holmes(2000:69-80)将描写研究和理论研究、应用研究一起,归入了翻译研究的路线图。Holmes 认为描写翻译研究应聚焦于产品、过程和功能三个方面;产品导向的研究首先关注个别译本的语篇特点,然后基于大语料对相同源语文本的不同译本进行历时或共时的比较性描写(comparative description);功能导向的研究旨在描写译本在目标语语境的社会功能,该领域也是翻译社会学研究的内容;过程导向的研究针对译者重构目标语文本的认知、心理过程即翻译操作行动(translation act),该领域也是翻译心理学的研究范围(Holmes 2000:72-73)。

以此为基础,Toury(1995,2012)提出了旨在“重构”翻译规范、提炼翻译法则(translation law)的描写研究方法论,成为之后翻译学研究的重要路径,“翻译规范”的理论价值得到了学界的“大力肯定”(asserted strongly)(Schäffner 1999:1)。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也先后对该路径进行了评介和探讨。例如,林克难(2001:43;2008:88)主张应将“规范”和“描写”有机结合起来,徐敏慧(2017:11)则认为描写翻译研究中需整合译者惯习和翻译规范。基于 Toury 的理论,余静(2017:11-17;2020:92-99)提出了文学方言描写翻译研究的路线图和规范冲突中的翻译行为模式,张道振(2021:94-102)构建了翻译批评的描写途径。此外,谭业升(2006:51)强调描写翻译研究中的翻译文本分析,不宜以某种特定理论假设为基础,需采用开放性视角,这正好论及了 Toury 描写翻译研究的一个局限性:在“描写”之前,其关于翻译规范的理论解释已然存在。

Toury(1995:17-18,2012:11-12)认为,描写和理论翻译研究具有为翻译研究的应用分支提供“连接规则”(bridging rules)的功能。这里的“规则”指关于翻译行为的实证数据和理论假设,解释“翻译过程发生了什么、翻译该如何做”的问题,它是翻译批评、翻译教学和制订翻译政策的方法论理据(Toury 1995:17-18)。然而,无论是描写翻译研究还是理论研究,目前还都不能为这些实践领域提供“连接”(Rabadán 2008:104),同时“纯翻译研究”的这两个领域本身也缺少连接(Chesterman 2005:197-198)。需要指出,Toury 的描写翻译研究面临因“翻译规范”与翻译操作行动之间的距离太大、文本数据分析时不可避免地需诉诸“主观解释”等问题,这使得这种自然性实证研究走向了混合解释主义的折衷主义。有鉴于此,对描写翻译研究进行重新考量是必要的。

2. Toury 的描写翻译研究及其困境

Hermans 和 Toury 都是描写翻译研究的倡导者,他们均强调社会-文化因素与翻译操作行动的制约,只是前者主张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等是支配译者翻译决策的主要因素,认为翻译活动中“为了特定目的需对源语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操控”(manipulation of the source text for a certain purpose)(Hermans 1985:11);Toury 则主张翻译是一种“受规范支配的社会活动”(norm-governed activity),翻译规范作为制约翻译活动的社会-文化制约因素(sociocultural constraints),指某一翻译社团内人们评价特定情景中的翻译正确与否、妥当与否、详尽与否的普遍价值或观念,它明示了翻译行为能被接受、容许乃至容忍的程度和范围,为此是评价翻译行为的标准(Toury 1995:55,2000:

191-202)。翻译规范不但“支配”各种类型的翻译活动,而且在翻译活动的每个阶段及其产品的不同语篇层面都起作用(Toury 2000:191-202)。Toury 既认为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又是一种认知决策的操作行动(act of translation),其中行动镶嵌(embedded)于活动(Toury 1999:13;侯林平、何元建 2018:61),活动通过行动来实现,为此翻译活动和操作行动均受翻译规范的“支配”(Toury 1999:18)。

由于“是否为译”的问题尚无定论,Toury 便提出了翻译的工作定义即“假定的翻译”(assumed translations),它指那些无论基于何种条件在目标语文化语境都被当作翻译的语篇(utterances)、语篇内在的现象以及生成这些语篇的过程(processes);假定的翻译包含三个基本条件:有确定的源语文本、双语转换过程和基于共享语篇特征的双语文本关系(Toury 2012:27-28)。

“功能”“产品”和“过程”是描写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功能”指译本在目标语社会-文化语境的效果或地位,“产品”是指具有特定语篇-语言特点的译本,“过程”指选择翻译策略将源语文本转化为目标语文本的操作过程。它们之间是逐层“决定”和“支配”的关系:译本在目标语文化系统的地位或功能“决定”(determines)译本的语篇-语言结构(语篇表层特点),而后者“支配”(governs)依据源语文本构建目标语文本及两者文本关系的翻译策略选择过程;换言之,译者根据译本在目标语语境“可能实现的功能”(prospective function),选择语篇-语言手段和翻译策略(Toury 2012:6)。不难看出,这是针对翻译操作行动“功能”“产品”和“过程”内在关系的理论解释。

据此,Toury 提出了描写翻译行动的研究程序:以译本的接受性及“是否为译”的假设为出发点,通过比较源语文本及映射其语篇特点的目标语文本,比较源语文本中的翻译问题及解决问题的目标语手段,归纳从不同语篇层次和翻译单位收集(针对译本语篇-语言特点、翻译策略)的文本证据,重构“翻译过程”,进而扩大语料,实施更高层次的概括(Toury 2012:31-33)。该程序既解答“经过怎样的翻译决策过程,产出了具有何种语篇-语言特点的产品,该产品具有何种社会-文化功能”的问题,也为“产品功能‘决定’译者在翻译行动中选择语篇-语言手段和翻译策略”的理论解释提供实证支持。

如上所述,翻译是一种受规范支配的社会活动,该活动通过翻译操作行动来实现(Toury 1999:9)。关于翻译规范“重构”,Toury (2012:87-88)认为既可从翻译行动的“产品”即译本本身获得文内资源(textual resource),又可从译者、编辑、出版商等翻译活动参与者的翻译评论或“半理论”式的论述等文外途径获得数据。不难看出,此处 Toury 沿用的依然是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传统路径。如 Toury (1999:18)所言,翻译规范等社会-文化制约因素和翻译操作行动之间的距离太大(gross exaggeration)。需要指出,除了翻译规范和译本的社会-文化功能,翻译操作行动还受伦理、意识形态、语言/翻译政策、规章乃至法律等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支配,更受人际关系、时间、地点、源语文本功能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单单基于这两种数据资源“重构”的翻译规范,还远不能为“功能”“产品”和“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即“经过怎样的翻译过程、生成具有何种文体特点和功能的译本”问题提供充分解释,更何况这两种数据资源的范围也并不确定。这样,描写翻译研究便出现了理解的“空白”(Chesterman 2008:363-377),不可避免地需诉诸主观阐释和经验判断,也就是说,基于实证主义传统的描写翻译研究需向解释主义做出必要让步(crucial concession),从而使其步向了折衷主义(eclecticism)(Crisafulli 2002:26)。这是 Toury 描写翻译研究的困境之一。

Toury (2004)认为,鉴于翻译语境因素的广泛性(vastness)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特点,翻译研究中不可能有“决定性的解释”(deterministic explanation)。为此,其目的应该是构建一个由相互

联系、相互依存的盖然性结论(probabilistic statements)构成的理论系统(Toury 2004:15)。就描写翻译研究而言,其盖然性结论指“如果条件 X 出现,现象 Y 产生的可能性就会更大或更小”(Toury 2012:301)。需要指出,翻译理论的主要功能是解释和预测各种翻译现象(Holmes 2000:73)。由于盖然性结论本身也蕴含“即使条件 X 出现,现象 Y 不产生的可能性也存在”的命题,为此,单单基于描写翻译研究的“盖然性结论”,不可能构建出具有充分解释和预测功能的理论系统。对此,Toury (2004)本人也指出,由于目前无法穷尽所有可能的变量,现在讨论构建这个理论系统“肯定为时尚早”(certainly premature)(Toury 2004:25)。

整体而言,Toury 的研究兴趣是描写-解释性的(descriptive-explanatory)(Toury 1999:10),即通过描写译本的目标语社会-文化功能、语篇-语言特点,收集可观察的文本证据,“重构”翻译规范制约下的翻译决策过程,继而提出针对“功能”“产品”和“过程”内在联系的解释。不难发现,虽然 Toury 声称描写翻译研究的盖然性推理(probabilistic reasoning)和理论解释的决定性命题(deterministic proposition)不能共现、互不相容(Toury 2004:25),但在其倡导的“翻译描写”之前,解释“功能”“产品”和“过程”关系的理论模式已然存在:翻译规范“支配”翻译活动和操作行动;翻译规范、译本在目标语语境中的社会-文化功能“决定”译本的语篇-语言特征,进而“支配”译者根据源语文本重构目标语文本的认知决策过程。这样,通过描写翻译“产品”功能、语篇-语言特点收集实证数据,仅是为了证明规范制约下翻译操作行动理论的“正确性”。当然,该理论本身也存在上述变量间距离太大等问题。这样,探究自然情景中翻译现象的归纳性实证研究,仅仅变成了为已有理论解释的合理性提供文本证据。可见,“不需要但又离不开理论解释”是 Toury 描写翻译研究的另一困境。有鉴于此,有必要寻求描写翻译研究的新途径。

3. 新描写主义方法论

新描写主义(Neo-descriptivism/New Descriptivism)是社会学、语言哲学、句法/语义学研究中的一种新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其哲学基础源于 Wittgenstein(1953:47)关于描写的主张:哲学考察中仅需要描写便可完成,描写中必须去掉一切解释:“勿要有任何假设”“勿走向任何理论”。换言之,描写是一个摒弃理论假设的单纯、确定的发现过程。在此过程中,需对事物进行“边看边思”(look and see),探寻其是否有共同之处;所谓“边看边思”即通过观察,将整个系列现象的相似之处、关系进行归纳和范畴化(Wittgenstein 1953:31)。社会学研究中,Latour(2005:136-137)也主张“勿要以为坚持描写(sticking to description)就是丢脸的事”,相反它是远高于解释的“高级、稀有的成就”(the highest and rarest achievement);描写是一种优于解释而不是专门为理论解释准备的研究方法(Dean 2020:528)。语言学中的新描写主义产生于指称意义与专名关系的讨论,倡导“精致描写”(rigidified description),反对包含直觉和历史经验的质性描写(qualitative description)(Jackson 2017:17-26);它强调采用不断演进的科学分析工具,对微观语言现象和语用实践进行细致描写(胡建华 2018:475)。

整体而言,新描写主义依然坚持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传统和自然性实证研究的程序,只是它主张摒弃包含主体经验、价值判断和理论解释的质性描写,以及“为了迁就理论而选择性地使用语言事实”,以验证该理论正确性的“循环性”描写(胡建华 2018:475)。通常,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分为哲学或理论方法(approach)、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method)、收集和分析数据的手段(procedure)或技巧(technique)三个层次(Holfler 1983:71-72)。需要指出,新描写主义研究并非主张放弃理论,而是放弃对理论正确性的迷信,强调基于科学、细致的描写发现,对理论或理论的某一方面进行证伪,以实现促进学科理论范式演进发展的目的。换言之,主张理论和已有

结论的“可证伪性”,是新描写主义研究的特征之一(胡建华 2018:475)。在研究方法的第二个层次,新描写主义倡导“问题的真实性原则”,强调探究自然情景中的真实语言事实和语用实践中的“反常现象”和“真问题”;在方法的第三个层面,新描写主义注重观察范围和研究对象的确定性,主张从微观、精细的语言现象出发逐级描写,反对概览式的宏观叙事,强调数据收集工具的科学性和学理性;需要补充的是,新描写主义始于语言微观现象观察,但并非止于语言事实和文本数据的堆砌统计,而是通过揭示隐性语言事实解答真实问题,证伪、修订和完善学科理论(杜世洪 2018:540)。

4. 新描写主义途径的描写翻译研究

如上文所述,由于翻译规范与操作行动之间距离太大,Toury 的描写翻译研究在文本数据解释时需诉诸主观阐释和经验判断,这使其走向了混合解释主义的折衷主义困境,同时以翻译规范或“惯习中介的规范关系”(habitus-mediated relations of norms)等理论模式作为解释框架(Simeoni 1998:1-39),又步入了“不需要而离不开理论”的困境。新描写主义方法论主张摒弃传统研究中的质性描写和以验证理论正确性为目的的循环描写,倡导旨在探究语言事实和语用实践中的“反常现象”和“真问题”,促进理论范式的演进更替,聚焦于微观语言现象的精致描写。这为描写翻译研究摆脱上述困境提供了方法论理据。

(1) 研究范围和对象

Toury 的描写翻译研究范围包括“受规范支配的社会活动”,以及译者选择翻译策略重构目标语文本的操作行动,主要针对译本在目标语语境的社会-文化功能、译本的语篇-语言特点和翻译操作行动过程。所谓活动是主体在特定需求、动机的驱使下发起,在不同分工的社会个体参与下,将客体转化为对所有参与者都有意义的“产品”的过程,该过程受规范、伦理、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因素的约束。需要指出,翻译活动和操作行动之间还包括“行为”这一元素。行为与活动和操作行动的不同在于其具有目的性和情景性特点,也就是说它受主体在特定情景中的意图或目的的支配。通常,语言使用活动是通过“目的导向的行为”(goal-directed actions)来实现,而行为是通过惯例化的(routinized)操作行动来实现的(Steiner 1988:144-173)。同样,翻译活动需通过翻译行为来实现,而翻译行为是通过操作行动来变为现实的(Chesterman 1997:88-90)。据此,可将描写翻译研究的范围归纳为翻译活动的分层实现过程、产品特点及功能。

新描写主义研究的目的之一是通过证伪、修订既有理论解释,促进学科理论范式的演进发展,故此,翻译研究的理论成果也应属于“描写”的对象。也就是说,通过对相同主题的研究成果进行“边看边思”,可探究其关注对象的相似或共同之处,从而认识它们构成的整个系列。例如,虽然“翻译策略”是翻译学领域被论及最多的概念,但学界对它的定义却纷杂不一(方梦之 2013:1;熊兵 2014:82-88;韩江洪 2015:75-76)。国内重要翻译学期刊上刊发的定义包括:翻译策略即“翻译过程中的思路、途径、方式和程序”(方梦之 2013:2);它是“从事翻译这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的具体手段和方法,约略等于翻译方法”(韩江洪 2015:1);翻译策略是翻译活动中实现特定翻译目的“所依据的原则和所采纳的方案集合”(熊兵 2014:83)等。显然,这些界定各不相同,而且有的定义把翻译策略等同于翻译方法和手段。需要指出,通过对翻译策略的国际研究成果进行“边看边思”,可发现其定义却趋于一致。

如下页表1所示,“翻译问题”是上述翻译策略定义中的共同因素,据此可将其进一步概括为:翻译策略是译者为解决翻译问题而有意识、有目的地制定和实施的方案或措施。也就是说,译者因翻译问题的存在而选择翻译策略。

表1 国际研究中的翻译策略定义

翻译策略定义	
1	翻译策略是译者根据“本有意识”(potentially consciously)为解决具体翻译任务中的翻译问题而制定的方案(Krings 1986:18)。
2	翻译过程中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翻译问题(Lörscher 1996:27)。
3	翻译策略是为了解决翻译问题而在特定情景中所采用的行为方案(Chesterman 1997:89)。
4	无论是面向整个文本的宏观翻译策略,还是针对某个或某些文本片段的微观策略,都是因翻译问题而做出的选择(Bell 1998:188)
5	翻译策略是译者选择适当的潜在手段(potential procedures),解决其有意识发现翻译问题的步骤(Scott-Tennent et al. 2000:108)
6	翻译策略是以解决翻译问题为目的导向的(Zabalbeascoa 2000:120)
7	翻译决策属于译者的个体行为,是其根据特定需求和机制(mechanism)解决翻译问题的手段(Hurtado Albir 2001:249-250)。
8	作为翻译能力的核心要素,策略能力是解决翻译问题、保证翻译过程效率的程序性知识,其主要功能是发现并解决翻译问题(PACTE 2017:40)
9	

此外,新描写主义倡导对真实情景中语用实践的“精致”观察,为此翻译实践者的经验总结和心得体会也应属于描写翻译研究的范围。如 Schürmann (2008:21-30) 所言,“实践的逻辑不同于理论的逻辑,把实践的逻辑等同于理论是谬误的”。也就是说,将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翻译“操控论”“目的论”等直接应用于翻译课堂,指导学生翻译实践并不适当。假如译者以“目的论”为实践指南,其翻译行为有可能为了实现服务委托人的目的,而违反翻译规范、职业伦理乃至相关法律、法规。为此,对于翻译实践中普遍会遇到的翻译问题,通过描写翻译实践者决策的经验话语,可提炼翻译实践方法论,从而为翻译教学等提供理据。这样,描写翻译研究既面向翻译活动的分层实现过程、产品和功能,也针对翻译活动主体的经验话语以及相同主题的翻译研究成果。

需要指出,新描写主义倡导探究真实语用实践中的“反常现象”和“真问题”,描写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应是翻译活动中的翻译问题及解决问题的翻译策略。本质上讲,翻译是一种问题决策活动(problem-solving activity)(Pym 2007:44),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要任务是翻译问题决策。机器翻译之所以不能取代人工翻译,其主要原因就是其尚不完全具备发现并解决翻译问题的策略能力。翻译问题是翻译活动中每位译者都会面对的客观的或具有主体间性特点的困难或任务(Nord 2006:166-167)。翻译问题的产生意味着译者必须花费更多的处理努力,对源语文本语篇结构的某个或某些方面进行增减、替换或调整。诚然,翻译问题决策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除了因双语语言、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语言和规约性翻译问题、由源语文本的标记性语篇特征而造成的语篇问题,还有因双语文本在各自交际情景中功能的不同而产生的语用翻译问题(Nord 2006:166-167),更包括译者翻译行为与职业伦理规范、法律规章不相符而产生的职业翻译问题等(Sang 2018:133)。翻译问题或来自源语文本的语音、词汇、词组、句群、衔接手段、话语标记等处于不同语篇层次、具有不同主题相关度的语篇内容,或源于双语文本的语境功能。换言之,对于同一语篇中的同

类翻译问题,如果其所处语篇层次或主题相关度不同,译者选择的策略也可能不同。一定程度上讲,使翻译活动、行为得以实现的翻译操作行动,是译者选择翻译策略解决问题的认知决策过程。鉴于双语文本的语篇-语言特点及其所处的文本语境是翻译问题产生的原因,故通过对其进行对比描写,标注和归纳翻译问题及翻译策略,是探究翻译操作行动,进而重构翻译活动实现过程的途径。

(2) 文本描写工具的科学性和学理性

新描写主义并非主张摒弃理论,而是强调采用不断演进的科学和学科理论工具收集可观察的实证数据。双语文本语境和语篇-语言特点对比,是收集翻译问题及翻译策略实证数据的途径。研究中需诉诸语篇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自然语言处理乃至人工智能领域的文本分析工具或理论模型。对于语篇的微观表层结构,可采用语料库工具收集句法复杂度、词汇密度、平均句/词长、词长分布、高频词、词类分布、类符-形符比等数据;至于语篇深层结构,则可采用自然语言处理乃至深度学习领域的语义分析工具。对于双语文本语境描写,可通过语域特点对比来实现(Halliday 1989:29-30; Steiner 2004:14-16)。诚然,采用上述领域的文本分析工具,注重描写观察的科学性和学理性,是描写翻译研究摆脱基于主观解释和经验判断的文本描写传统,实现“精致描写”的保证。

(3) 研究目的

新描写主义翻译研究以探究翻译活动中的“真问题”及证伪、修订现有翻译理论为目的。一方面,通过描写翻译实践活动中的翻译问题及策略,不但能为翻译活动过程、产品和功能的探究提供实证支持,更能为翻译批评、翻译教学、机器翻译等提供方法论理据;另一方面,基于从自然情景中所收集的可观察数据,对现有理论或理论的某个或某些方面进行证伪、修订,可推进翻译理论的演进和发展。为此,新描写主义研究是为翻译学理论研究、描写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连接”的途径。也就是说,其功能在于“解构”现有理论的“权威性”、推进学科理论范式的发展,促成翻译学各分支的衔接。

与 Toury 所倡导的描写翻译研究一样,新描写主义翻译研究也属于自然性实证研究的范畴,只是其研究范围不仅包含翻译活动的过程、产品及功能,也针对翻译研究成果和翻译实践者的经验话语,其主要研究对象为翻译实践中的真实翻译问题及解决问题的翻译策略。需要指出,注重描写工具的科学性、学理性,以及主张研究目的在于探究真实翻译问题和基于可观察的实证数据证伪、修订现有翻译理论,是新描写主义翻译研究的区别性特征。

5. 结论

基于 Holmes 的翻译研究路线图,Toury (1995) 提出了旨在“重构”翻译规范的描写翻译研究。在 Toury 的框架下,翻译是一种受规范支配的社会活动,翻译规范支配译者构建具有一定语篇-语言特点和社会-文化功能“产品”的操作行动。就翻译操作行动而言,译本在目标语语境的功能和地位决定其语篇-语言特点,进而支配译者构建目标语文本及两者文本关系的翻译策略选择过程。需要指出,除了翻译规范,翻译操作行动还受到职业伦理、意识形态、语言政策乃至法律规章等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约束,同时更受到人际关系、情景意图、源语文本特点与功能、技术手段等诸多情景或条件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说翻译规范与翻译操作行动之间的“距离太大”。这样,描写翻译研究中为了弥补理解两者关系的“空白”,不可避免地要诉诸主观解释和经验判断,这使其步入了混合解释主义的折衷主义处境。此外,描写翻译研究本应是一个“从不知到知”的探究过程,而采用既成的理论框架解释通过大量双语语料对比而收集的可观察数据,又使其陷入了“不需要

但又离不开理论”的困境。

对此,参照语言哲学、语义学等领域的新描写主义方法论,从研究目的、描写工具、研究范围和对象等方面,可对 Toury 的描写翻译研究进行修订。作为一种自然性实证研究,描写翻译研究需摒弃“质性描写”及因迁就某一理论而证明其合理的“循环性描写”传统,注重文本分析工具的学理性和科学性,突出以描写翻译实践活动中的真实翻译问题和以证伪、修订现有理论成果为目的。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在理论内部兜圈子、贴标签式的研究”(胡建华 2018:476),从而促成翻译研究各分支间的衔接和勾连。

诚然,描写研究毕竟是针对研究对象外部特征的归纳性探究过程。除此之外,实证研究还包括以验证理论假设为主要目的、针对研究对象内部因素的控制性实验研究。也就是说,面向翻译决策认知过程等问题的实验研究,也是促进翻译理论演进、发展的途径。需要补充的是,新描写主义翻译研究主张摒弃自然描写中的主观解释和经验判断,但并不反对翻译的解释主义研究,在翻译史、翻译诗学和翻译修辞等领域,解释主义仍然是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参考文献:

- [1] Bell, R. T. Psychological/cognitive approaches [C] // Baker, M.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185 – 190.
- [2] Bloomfield, L. *Language* [M].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 [3] Bouma, G. D. *The Research Process* [M].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4] Burrell, G. & G. Morgan. *Sociological Paradigms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M]. London: Heinemann Books, 1979.
- [5] Crisafulli, E. The quest for an eclecticist methodology of translation description [C] // Hermans, T. *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II: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Routledge, 2002. 26 – 44.
- [6] Chatman, S. Towards a theory of narrative [J]. *New Literary History*, 1975, 6(2): 295 – 318.
- [7] Chesterman, A.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 Amsterdam: Benjamins, 1997.
- [8] Chesterman, A. Causality in translator training [C] // Tennyson, M. *Training for New Millennium: Pedagogies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5. 191 – 205.
- [9] Chesterman, A. On explanation [C] // Pym, A., Shlesinger, M. & D. Simeoni. *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2008. 363 – 381
- [10] Dean, T. Genre blindness in the new descriptivism [J].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2020, 81(4): 527 – 552.
- [11] Halliday, M. & R. Hasan.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2] Krings, H. P. *Was in den Köpfen von Übersetzern vorgeht. Eine empirische Untersuchung der Struktur des Übersetzungsprozesses an fortgeschrittenen Französischlernern* [M].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86.
- [13] Hermans, T.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
- [14] Holmes, J. 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 // Venuti, L.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0. 172 – 186.
- [15] Hurtado Albir, A. *Traducción y Traductología. Introducción a la Traductología* [M]. Madrid: Cátedra, 2001.
- [16]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 Press, 2005.
- [17] Lörcher, W. A Psycholinguistic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processes [J]. *Meta*, 1996 (1), 26 – 32.
 - [18] Jackson, F. Reference and description from the descriptivists' corner [J]. *Philosophical Books*, 2007, 48 (1): 17 – 26.
 - [19] Nord, C.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 [20] PACTE. PACTE Translation competence model [C] // Hurtado Albir, A. *Research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by PACTE Group*.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35 – 41.
 - [21] Pym, A. Philosophy and translation [C] // Kuhiwczak, P. & K. Littau. *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7. 24 – 44.
 - [22] Rabadán, R. Refining the idea of “applied extension” [C] // Pym, A., Shlesinger, M. & D. Simeoni. *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8. 109 – 119.
 - [23] Sang, Z. G. How does the context make a translation happen? An activity theory perspective [J]. *Social Semiotics*, 2018, (1): 125 – 141.
 - [24] Schäffner, C. The concept of norm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 // Schäffner, C. *Translation and Norm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9. 1 – 9.
 - [25] Schürmann, V. Prozess und tätigkeit. zur spezifik der tätigkeitstheorie [J]. *Behindertenpädagogik*, 2008, 47 (1): 21 – 30.
 - [26] Scott-Tennent, C., Gonzalez Davies, M. & F. Rodriguez Torra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ranslation solutions: Design of a teaching prototype and empirical study of its results [C] // Beeby, A., Ensinger, D. & M. Presas. *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0. 107 – 117.
 - [27] Simeoni, D. The pivotal role of the translator's habitus [J]. *Target*, 1998, (10): 1 – 39.
 - [28] Steiner, E. Describing language as activity: An application to child language [C] // Fawcett, R. P. & D. J. Young. *New Developments in Systemic Linguistics, Vol 2: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Printer, 1988. 144 – 173.
 - [29] Steiner, E. *Translated Texts: Properties, Variants, Evaluations* [M]. Peter Lang Verlag: Frankfurt, 2004.
 - [30] Toulmin, S., Rieke, R. & A. Janik. *An Introduction to Reasoning* [M]. New York: Macmillan, 1984.
 - [31]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1995.
 - [32] Toury, G. A Handful 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 and “norms” [C] // Schäffner, C. *Translation and Norm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9. 9 – 31.
 - [33] Toury, G. Probabilistic explanation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 // Mauranen, A. & P. Kujamäki. *Translation Universals: Do They Exist?*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2004. 15 – 33.
 - [34]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revised edition)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2012.
 - [35] Williams, J. & A. Chesterman. *The Map: A Beginner's Guide to Doing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2.
 - [36] 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M]. Tran. G. E. M. Anscomb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58.
 - [37] Zabalbeascoa, P. From techniques to types of solutions [C] // Beeby, A., Ensinger, D. & M. Presas. *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0. 117 – 129.
 - [38] 杜世洪. 新描写主义与“假装”的高阶描写[J]. 当代语言学, 2018, 20(4): 537 – 551.
 - [39] 方梦之. 翻译策略的理据、要素与特征[J]. 上海翻译, 2013, (2): 1 – 5.
 - [40] 韩江洪. 国内翻译策略研究述评[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5, (1): 75 – 80.

- [41] 侯林平,何元建. 翻译过程研究的认知模式与社会模式——《描写翻译认知过程:行为与事件》评介[J]. 外国语,2017,40(5):61-70.
- [42] 胡建华. 什么是新描写主义[J]. 当代语言学,2018,20(4):475-477.
- [43] 林克难. 翻译研究:从规范走向描写[J]. 中国翻译,2001,(6):43-45.
- [44] 林克难. 翻译的规范研究和描写研究[J]. 中国外语,2008,(1):88-92.
- [45] 谭业升. 论翻译文本对比分析的描写翻译学方法[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2):48-51.
- [46] 熊兵. 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以“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为例[J]. 中国翻译,2014,(3):82-88.
- [47] 徐敏慧. 从翻译规范到译者惯习:描写翻译研究的新发展[J]. 中国翻译,2017,38(6):11-17.
- [48] 余静. 文学方言描写翻译研究路线图[J]. 中国翻译,2018,39(3):19-27.
- [49] 余静. 规范冲突中的翻译行为模式研究[J]. 外国语,2020,43(4):92-99.
- [50] 张道振. 从传统走向现代——论描写翻译批评的现代理念、方法和任务[J]. 外国语,2021,44(6):94-10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语境中敦煌叙事文献的翻译活动史通论”(20AZD129)

收稿日期:2022-02-16

作者简介:桑仲刚(1976-),男,甘肃天水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及语用学研究。

“翻译研究新趋势丛书”出版



翻译作为在多元文化和多语言环境中促进交流和对话的手段,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从 Peter Lang 出版社精选引进“翻译研究新趋势丛书”,聚焦当下多媒体新环境中的翻译研究,内容涉及视听媒体、互联网和新兴技术等。

本套丛书旨在反映翻译研究领域的新趋势,促进从理论到实践,从应用到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丛书包括:

※《视听翻译 字幕翻译——理论与实践》

※《翻译技术研究》

※《实验室与教室的互馈——口笔译培训思考》

※《字幕问题——字幕翻译与外语学习新视角》